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政治学（第一辑）

Political science and government

政治科学与政府

〔美〕迦纳（J. W. Garner）著 孙寒冰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主 编 李天纲
中国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 · 政治学（第一辑）

Political science and government

政治科学与政府

〔美〕迦纳（J.W.Garner）著 孙寒冰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科学与政府/(美) 迦纳 (Garner, J. W.) 著; 孙寒冰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6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李天纲主编. 政治学)

ISBN 978-7-5520-1240-8

I. ①政… II. ①迦… ②孙… III. ①政治学②国家行政机
关 IV. ①D0②D03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2060号

政治科学与政府

主 编: 李天纲

编 纂: 赵 炬

责任编辑: 唐云松

特约编辑: 陈宁宁

封面设计: 清 风

策 划: 赵 炬

执 行: 取映文化

加工整理: 嘎 拉 江 岩 牵 牛 莉 娜

责任校对: 笑 然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622号 邮编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排 版: 上海永正彩色分色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00毫米 1/16开

字 数: 420千字

印 张: 38.75

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20-1240-8/D.360

定 价: 172.00元 (精装)

民国西学：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序

李天纲

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二十世纪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来自欧美的『西学』，以巨大的规模涌入中国，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与当地文化交换信息，激发思想，乃至产生新的理论，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公元九、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有一场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之外，还有欧洲十四、十五世纪从阿拉伯、希腊、希伯来等『东方』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汇入欧洲文化，史称『文艺复兴』。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西学』，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称之为『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并不过分。

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其实早有前奏。梁启超（1873-1929）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自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入中国之始。』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发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比清末的『西学』早了二百多年。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利、徐、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历算等『科学』著作，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灵言蠡勺》）、《形而上学》（《名理探》）等神学、哲学著作。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西学东渐』之始是对的，但他说其『范围亦限于天（文）、（历）算』，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一百年，直到今天。

从明末到清末的『西学』翻译只是开始，而且断断续续，并不连贯成为一场『运动』。各种原因导致了『西学』的挫折：被明清易代的战火打断；受清初『中国礼仪之争』的影响；欧洲在1773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鸦片战争以后很久，再次翻译『西学』，仍然只在上海和江南地区。从翻译规模来看，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影响力却仍然有限。梁启超说：『惟（上海江南）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李善兰、华蘅芳、赵仲涵等任笔受。其人皆学有根底，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李。』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但说『戊戌变法』之前的『西学』翻译只在上海、香港、澳门等地零散从事，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则是事实。

对明末和清末的『西学』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或曰中华民国时期的『西学』，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翻译运动』。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数以千计的『汉译名著』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1905年，清朝废除了科举制，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大学堂』的方式举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书院』系统改造而成。新建的大学、中学，数理化、文史哲、政法等等学科，都采用了翻译作品，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于是，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即在『四书五经』之外，还必须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西方经典』，甚至到了『言必称希腊、罗马』的程度。

我们在这里说『民国西学』，它的规模超过明末、清末；它的影响遍及沿海、内地；它借助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制度，渗透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这些结论虽然都还需要论证，但从一般直觉来看，是可以成立的。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现代化』、『世俗化』、『理性化』，都与『民国西学』的翻译介绍直接有关。然而，『民国西学』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规模？它是一

个怎样的体系？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认真研究，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还有，哪些著作得到了翻译，哪些译者的影响最大？『西学东渐』的代表，明末有徐光启，清末有严复，那『民国西学』的代表作在哪里？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并不能明确地回答，原因就在我们对民国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并无一个全程的了解，民国翻译的那些哲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西学』著作，束之高阁，已经好多年。

举例来说，1935年，上海生活书店编辑《全国总书目》，『网罗全国新书店、学术机关、文化团体、图书馆、政府机关、研究学会以及个人私家之出版物约二万种』。就是用这二万种新版图书，生活书店编制了一套全新分类，分为：『总类、哲学、社会科学、宗教、自然科学、文艺、语文学、史地、技术知识』。一瞥之下，这个图书分类法比今天的『人大图书分类法』更仔细，因为翻译介绍的思潮、学说、学科、流派更庞大。尽管并没有统一的『社科规划』和『文化战略』，『民国西学』却在『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查看《全国总书目》（上海，生活书店，1935），在『社会科学·社会学一般·社会主义』的子目录下，列有『社会主义概论、社会主义史、科学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议会派社会主义』等；在『社会科学·政治·政体政制』的子目录下，列有『政治制度概论、政治制度史、宪政、民主制、独裁制、联邦制、各种政制评述、各国政制、中国政制、现代政制、中国政制史』等，翻译、研究和出版，真的是与欧美接榫，与世界同步。1911年以后的38年的『民国西学』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我们却长期忽视，不作接续。

编辑出版一套『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把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期间翻译的社会科学和人文文学科著作重新刊印，对于我们估计、认识和研究『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接续当

时学统，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1980年代初，上海、北京的学术界以朱维铮、庞朴先生为代表，编辑『中国文化史丛书』，一个宗旨便是要接续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重振旗鼓，『整理国故』，先是恢复，然后才谈得上去超越。遗憾的是，最近三十年的『西学』研究却似乎没有采取『接续』民国传统的方法来做，我们急急乎又引进了许多新理论，诸如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还有『老三论』、『新三论』、『后现代』、『后殖民』等等新理论，对『民国西学』弃之如敝屣，避之唯恐不及。

民国时期确实没有突出的翻译人物，我们是指像严复那样的学者，单靠『严译八种』的稿酬就能成为商务印书馆大股东，还受邀担任多间大学的校长，几份报刊的主笔。但是，像王造时（1903-1971）先生那样在『西学』翻译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然后借此『西学』，主编报刊、杂志，在『反独裁』、『争民主』和『抗战救国』等舆论中取得重大影响的人物也不在少数。王造时的翻译作品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摩瓦特的《近代欧洲外交史》、《现代欧洲外交史》、拉铁耐的《美国外交政策史》、拉斯基的《国家的理论与实际》、《民主政治在危机中》。1931年，王先生曾担任光华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政治系主任，后来创办了《主张与批评》（1932）、《自由言论》（1933），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他在上海舆论界发表宪政、法治、理性的自由主义；他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则是英国费边社会主义、工联主义和公有化理论（见王造时著《荒谬集·我们的根本主张》，1935，上海，自由言论社）。非常可惜的是，王造时先生这样复杂、混合而理想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实践，在最近三十年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中并无讨论，原因显然是与大家不读，读不到，没有再版其作品有关。

我们说，『民国西学』本来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知识体系，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断裂』之后，学者并没有好好地反省一下，哪些可以继续和发展，哪些应该批判和扬弃。民国时期好多重要的翻译著作，我

们都没有再去翻看，认真比较，仔细理解。『改革、开放』以后，又一次『西学东渐』，大家只是急着去寻找更加新颖的『西学』，用新的取代旧的，从尼采、弗洛伊德……到福柯、德里达……就如同东北谚语讽刺的那样：『熊瞎子掰包谷，掰一个丢一个。』中国学者在『西学』宝库中寻找更新式的装备，在层出不穷的『西学』面前特别害怕落伍。这种心态里有一个幻觉：更新的理论，意味着更确定的真理，因而也能更有效地在中国使用，或者借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种实用主义的『西学观』，其实是一种懒惰、被动和浮躁的短视见解，不能积累起一个稍微深厚一点的现代文化。

讨论二十世纪的『西学』，一般是以五四『新青年』来代表，这其实相当偏颇。胡适、陈独秀等人固然在介绍和推广『西学』，倡导『启蒙』时居功至伟，但是『新文化运动』造成不断求新的风气，也使得这一派的『西学』浅尝辄止，比较肤浅，有些做法甚至不能代表『民国西学』。胡适先生回忆他们举办的《新青年》杂志，有一个宗旨是要『输入学理』，即翻译介绍欧洲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知识，他还大致理了一个系统，说『我们的《新青年》杂志，便曾经发行过一期「易卜生专号」，专门介绍这位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在这期上我写了首篇专论叫《易卜生主义》。《新青年》也曾出过一期「马克思专号」。另一个《新教育月刊》也曾出过一期「杜威专号」。至于对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日耳曼意识形态、盎格鲁·萨克逊思想体系和法兰西哲学等等的输入，也就习以为常了。』（唐德刚编译：《胡适口述自传》，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第191页）。胡适晚年清理的这个翻译目录，就是那一代青年不断寻找『真理』的轨迹。三四十年来，他们从一般的人性论学说，到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从不列颠宪政学说，到法兰西暴力革命理论、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想，再到英格兰自由主义主张，大致就是『输入学理』运动中的全部『西学』。

胡适一语道破地说：『这些新观念、新理论之输入，基本上为的是帮助解决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

问题。』胡适并不认为这种『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做法有什么不妥。相反，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学』的方法论，大多认为翻译为了『救国』，如同进口最新版本的克虏伯大炮能打胜仗，这就是『天经地义』。今天看来，这其实是一种庸俗意义的『实用主义』，是生吞活剥，不加消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或曰：是『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从我们收集整理『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的情况来看，『民国西学』是一个比北大『启蒙西学』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换句话说，我们认为『五四运动』及其启蒙大众的『西学』并不能够代表二十世纪中国西学翻译运动的全部面貌，在北大的『启蒙西学』之外，还有上海出版界翻译介绍的『民国西学』。或许我们应该把『启蒙西学』纳入『民国西学』体系，『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我们认为：中国二十世纪的西学翻译运动，为汉语世界增加了巨量的知识内容，引进了不同的思维形式，激发了更大的想象空间，这种跨文化交流引起的触动作用才是最为重要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变得不古不今，不中不西，并非简单的外来『冲击』所致，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因素综合而成。外来思想中包含的进步观点、立场、方案、主张、主义……具有普世主义的参考价值，但都要在理解、消化、吸收后才能成为汉语语境的一部分，才会有更好的发挥。在这一方面，明末徐光启有一个口号可以参考，那便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反过来说，『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而非搬用；『会通』的目的，不是为了把新旧思想调和成良莠不分，而是一种创新——『超胜』出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新文明。二十世纪的『民国西学』，是人类新文明的一个环节，值得我们捡起来，重头到底地细细阅读，好好思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邀我主编『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献弁言于此，是为序。

[美] 迦納 (J.W.Garner) 著 孫寒冰 譯

政治科學與政府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七月初版

譯者序

此書係譯自 James Wilford Garner 之 “Political Science and Government” (一九二八年出版)。著者爲美國當代著名之國際法學家與政治學家，其學術淵博，爲學者所共知。原書觀點，雖不盡與余同，然其論述政治之理論與實際，精微宏闊，凡一學說，一問題，莫不裒往綜今，旁徵博引，意賅言簡，不遺巨細，誠爲一比較完善之政治學教本。

民國十八年間，余在復旦大學及國立暨南大學講授政治學，即採此書爲教本。惟學生大半覺原文艱澀，閱讀時不免晦蒙，乃徇學生之請，隨講隨譯，油印爲講義，半載成十二章。嗣後即以此項油印譯稿爲講義，兩年中分發達千份。外間有向余函索此項講義者，亦有勸余付梓以饜讀者者，因於二十年將譯就之十二章交商務印書館出版，並擬將未完諸章繼續譯竣。斯時適有林昌恆君，窮三年之力，已將全書譯完，亦請商務出版，商務以已納余稿爲謝。林君遂商之於余，欲將十二章後余所未及畢譯者，採用渠譯，並懇余爲之校閱。余讀其稿，深佩其譯筆忠實，明晰無疵，遂允諾焉。

滬戰突起，日人肆虐，商務廠屋，悉付一炬，而此書未及出版，即同遭浩劫。迨商務復業，乃將舊稿重加整理，仍付鉛槧。

原書雖分『政治科學』與『政府』兩編，惟究其內容，似應劃爲三編，較合邏輯，故毅然分爲『緒論』、『國家論』及『政府論』三編。

譯事之艱，盡人皆知。余譯此書，大體試採直譯法，雖一無關緊要之形容字或疏狀字，亦盡譯無遺。惟西文字句，往往有長至數十字或百字者，其間句逗意義，看似間斷，實則相承，此等處間亦採用意譯。然而晦澀生疏，時或不免，譯者自承力絀，惟祈閱者諒之。

書中按語，雖間有說明余個人之意見處，惟大半係根據平日講學時應學生之質疑而加以解註及充實者，似近蛇足，然於國中圖書貧乏之際，得此當亦不無裨益。

原書精宏，引證至夥，其間自難免萬一之誤，譯者就能力所及，一一爲之校正。原著者引證他家學說時，往往斷章截句，破空而來，使閱者每感掩卷枯索之苦，譯者於此則參照其所引原本，加以補充，非敢自翊完善，要亦使閱者醒目已耳。

此稿若無劉南陔、王人麟、蘇繼卿、李聖五、殷以文、萬良溶、吳劍嵐、溫崇信、伍蠡甫、端木愷、耿淡如、吳頌皋諸舊友之督促與策勵，恐永無與閱者相見之期，書成之日，應誌不忘。至友章益朝夕過從，每於疑似處，不憚煩瑣，切磋磨琢，獲益匪鮮，尤爲銘感。

原序

余寫此書之目的，原在予專門學校及大學學生以一種比較內容完備材料新穎的『政治科學與政府』之教本。余並希望此書對於研究國家之基本問題及政府之組織與職能有興味者，亦可稍予贊助。

本書內容分爲兩編。第一編論究政治科學之性質、範圍與方法，及其與其他相聯的或運輸的科學之關係；國家之性質、構成要素與屬性；族國與民族；關於主權之性質的各派學說；國家之各種體制及國家之聯合。第二編討論政府之體制及其種類；各種政制之優劣；關於政府正當職權的各種主要理論，以及已往與現在政府在實際上所行使的權限；憲法之性質與種類；關於選舉權之性質的各種已往的學說，以及目前選舉團之組織；最後，世界各主要國家之立法、行政、司法各機關之構造與職務。此外著者儘力就各國之各種實施加以比較而評衡其得失，並依據理智與經驗而下論斷。

世界大戰後，政府組織發生許多根本變動，尤以歐洲各國爲最劇。君主政制或變共和，或另改組而趨於民主；根深蒂固之專制政制則被顛覆，而爲民主政制所替代；有悠遠歷史之政治結合亦告解體；強大國家多半分裂，且有自分裂進而組成新國者；往昔由君主頒布或貴族式機關所制定之憲法則爲新的民主憲法所移易，而此項新憲類皆含有一種詳密的權利宣言，闡揚主權在民之旨，並設定個人自由之種種保

障。選權之普及幾成各國之通例；戰前不知民主爲何物之國家，至此大多採取普及的、直接的、與男女平權的選舉制。在德國，當帝制時代，議會的責任政府制非僅從未得一基址，且被嘲爲與德意志的政府觀念相左，戰後乃亦突爲聯邦政府及各邦政府所採納。總統直接民選制，以及創制、複決、與罷免等民治方法，戰前固皆被目爲過激與危險者，亦皆通行無阻矣。凡此種種，皆爲歐洲政治組織上之一大變演，其重要事實余當在本書中儘量論述之。

有一時期，雖非全世界，至少歐洲，似已成爲威爾遜總統所謂『民主主義之安全地』。惟不旋踵而歐洲各國之毅然背叛民主主義並斥其爲已破產者，相繼而起。在意大利與西班牙，個人領袖之獨裁制，熾然之盛，已將吾人所習知躬行之民主主義掃蕩無遺；在匈牙利與波蘭，形勢雖差，然亦與意西兩國大體相似。俄國之無產階級專政，蓋建立於反民主主義之基礎上者，方亦整其部伍，鞏固其根株，並力使其餘部分之人頌信其爲政制中之最合理與最著成效者。

以前關於政府之組織與職能的一般觀念，戰後亦受到廣蔓的變更。悠久的並被視爲神聖不可侵犯的政治傳習，被斥爲陳腐而與當代情形不合。許多人皆變成激烈分子，並對社會之經濟的、社會的與政治的構造向來所依據的某些最基本之原則，加以抨擊。其他較溫和而穩重者則亦要求種種改革，如改變現行的立法代議制；予社會組織中之各大經濟的、宗教的、及職業的社團以政治自主權；擴張國家之職權；依

據社會應擔負其社員所受之一切損害的理論，確立各種廣大的國家保險制；等等。此外尚有一不可否認的事實，即一般素來同情及傾向於民主政制者，亦漸漸失去其往日的信仰，且懷疑民主主義首倡者及闡揚者所鼓吹之優點，與實際上所得的結果相衡，是否相符。蒲萊斯爵士因為擁護民主政制之最顯赫的戰士，力謂民主為政制中之比較完美者，亦不免顯露其悲觀；而與他抱同此懷疑態度者，在美國亦不乏其人。但蒲萊斯爵士皆坦然承認，再無更好之制度足以取民主政制而代之——至少除民主政制外，再無一更好之制度，可使最後握有決定政體之權的人民願意採納。

至於現在流行的見解在原則上是否健全，所建議的補救辦法是否能消除種種缺點，自然不免有許多爭論。但不論如何，在最後決定權屬於人民的國家中，需要健全之政治的與經濟的思想，殆從未有如目前之迫切，實為無可否認之事實。是以將來負解決此項問題之責任者，尤其是將來居領導社會思想與輿論地位的專門學校及大學之學生，更應有適當之能力，辨別政治與經濟理論之是否健全與是否適用；制度之真偽；政策對於各階級之人民在經濟上與社會上之是否能得其平。吾人深信欲求得此種判斷力，一部分至少須從研究已往大學者所闡釋的政治科學入手，尤其是研究政制之歷史與實際，以及紀載於政治論文中的經驗之結果。

本書只是提供此項材料的有限倉庫，如能幫助學生去評衡各種政治制度之優劣以及關於政府之

組織與職權的各派理論之得失，則著者將引爲莫大之榮幸。

本書所論究者自屬有限，爲讀者深究特殊問題之利益計，著者於每章之首，冠以關於研究該章所論列的問題之最佳參考書目，並於註腳中儘量援引其他各種資料。

本書有幾處係取材於余之舊作政治科學大綱（*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之某一部分，惟皆略加變動。同事 John A. Fairlie 教授曾校讀本書之某數章，並予余以聰睿的批評，獲益匪淺，至足銘感。

目次

譯者序

原序

第一編 緒論

第一章 政治科學之性質與範圍

一 政治科學之術語

缺乏正確的術語（三）——『政治』和『政治科學』（四）——『純理的』政治和『應用的』政治（六）——諸政治科學（一一）

二 定義與範圍

諸家的意見（一四）——相同點（一七）——政治哲學（一九）

三 政治學是不是一種科學

否定的意見（二〇）——肯定的意見（二二）